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Dostoevsky
after Bakhtin

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

[英]马尔科姆·琼斯◆著

赵亚莉 陈红薇 魏玉杰◆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英)琼斯著;赵亚莉,陈红薇,魏玉杰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211-6

I. ①巴…

II. ①琼… ②赵… ③陈… ④魏…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现实主义—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820 号

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者:(英)马尔科姆·琼斯 译 者:赵亚莉 陈红薇 魏玉杰

责任编辑:崔文辉 赵洪涛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x1000mm 1/16

印 张:16.25 字数:226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211-6

版 次:2011年1月第2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力。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中文版序言

得知该书将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者见面了，对此我深感荣幸，我非常愿意借此机会为该中文版添加一个新的序。

如前言中所提到的那样，该书最早的英文版是源于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应邀为剑桥大学俄语学生所作的一系列讲座。当时我是诺丁汉大学斯拉夫文化研究所的教授，有些材料在大学讲课时还曾用到过。我写此书的初衷是想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西方大学里研究的更加广阔的文化问题联系起来，此外，也想将它们介绍给那些以俄语为母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们。后来，该材料经重新整理后，曾作为会议论文出现并出版，其读者对象是讲英语的俄罗斯文学专家和从事比较文学的专家们。此书的英文版于 1990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俄文版于 1998 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我一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非俄国作家放在一起，这一点也许会令一些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其实，正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文化和非俄国文化两者的相互影响，才使他拥有了作为一个世界性伟大作家而非仅仅是俄国的伟大作家的地位。我认为，他的伟大性就在于他不懈地致力于与世界性的而非单纯是本土的知识和文化的发展的交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属于全世界的经典作家，因为他超越了他自身的民族文化，但同时，如果没有对其民族文化的忠诚，他也无法实现这种超越。因此，我希望中国读者能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这会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那些在他看来毫无



疑问为异类文化中所受到的关注。

由于这一缘故，此书应被看为是解释性的，而非界定性的评论。它所寻求的不是对先前各种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模式的纠正或替代，它要做的是重新审视阐释上的难题，以展示现代视角对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的影响，与此同时，也鼓励读者在阅读策略上采用更加大胆创新的态度。我希望中国读者能了解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所出现的全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成果，并从中受益；对于这些研究，我在书中曾一再提到，并且，我本人也受益匪浅。

在此，我还要向其他一些人士表示我的感谢。我最早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那时，我尚是一名学生，受教于诺丁汉大学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弗兰克·西利。是西利先生把我引入了巴赫金作品的世界，当时，巴赫金的著作尚未在苏联出版，巴赫金的名字更远未成为一个风靡一时的神话。在巴赫金的作品中，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其 1929 年的版本（没有哪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会忘掉这一版本），那时，1963 年的版本尚未问世。作为一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博士生，我首次领略到了苏联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界博大精深的研究成果。稍后，我又有幸分别于 1971 年在巴特埃姆斯举行的首届陀思妥耶夫斯基研讨会上、1973 年在华沙举行的第七次斯拉夫国际大会上和于 1974 年在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结识了一些世界上顶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家。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已逝的苏联著名学者弗里德连捷尔和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之家（文学研究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小组，弗里德连捷尔本人、图尼马诺夫和韦特洛夫斯凯是该小组的支柱性人物。时光流逝如水，我所结识的学者圈子也随着各届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会的举行在不断扩大，这一学会包容了来自世界各地二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并且，本人还荣幸地成为 1995 年到 1998 年间该学会的会长。我真想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表达我由衷的谢意，但他们的名字众如繁星，我无法一一道来，一些人的大名已在该书和我出版的其他书里出





现过。

最后，我还要向林精华教授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和本书的译者赵亚莉、陈红薇、魏玉杰等人的辛勤工作，表达我的特别感激之情，是林教授的创意和他的同人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本书的中文版问世。

马尔科姆·琼斯
英国，诺丁汉大学
2003年3月



原 序

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说，当人们对某一起主导作用的认知范式 (paradigm) 产生分歧时，当这个一直以来在某一特别领域起支配作用的范式，在应用中暴露出种种不规则情形，其数量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以至于无法令人信服地与该领域保持一致时，科学就会产生周期性危机。到这个时候，新的认知范式就会被介绍进来，以期更圆满地解释例证，并促使对先时起支配作用的范式进行重新评价。^[1]

在他那个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的看法和上述过程十分相似。他注意到，社会经历着一场危机，那个曾把上帝和人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的旧的认知范式，不论是变好还是变坏（他倾向变坏），已不足以用做人们解释一切的证据。在这场危机里，不同范式之间相互竞争，发生了无政府状态式的碰撞，每个范式不但有其拥护者，而且或多或少都又有充分的事实作为后盾，但是当在每一个新范式上达成普遍共识时，这并不意味着非得抛弃或重新评估其他范式。也许正是这一根本性的特征，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上去显得如此摩登（一个不时更换旧式衣裳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者）。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类似的观点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白痴》(The Idiot)^[2]里，人物讨论的观点是：对于中世纪的人们来讲，具有约束力的观点只有一个，而现在人们却被无数相互挑战的观点所迷惑，这些观点彼此竞争以获得人们的青睐，同时又念念不忘瓦解对方。总之，鲜活的生活让他们困惑。显然，陀思妥

耶夫斯基认为基督教思想从根本上将仍然坚固可靠，但它需要按照新的方式加以完善以适应更为复杂的社会，绝不是按照天主教、新教、派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传统方式来完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东正教出现的姿态很低，这表明尽管他极其虔诚，但他也认为东正教已不再是完美无缺。用巴赫金（Bakhtin）的术语来说，只有将它的“权威性话语”（authoritative discourse）进行整合，使其成为新的“具有内部有说服力的话语”，才会赢得普遍而广泛的接受。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证实了上面的情况：这种周期性危机确实到了重新评价的边缘。但是他的小说做的远比这多，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观念和情感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描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危机，而且也是个人情感和社会心理危机。总有读者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完成了这个突破，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具有代表性，因此若从定义出发，他并没有突破，或者说，即使突破了，也没有达到让世人接受的程度。

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因为本书要重新评价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并非世界。我的方法还是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许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曾引发出许多争议。大多数情况下，我相信可能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但我还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与各种各样的文本联系起来。从问题的角度看，这些文本要么具有天然的优先权，如“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双重人格》（The Double）的‘看法’？”要么提供了有特色和便利的例证。把每一章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主要作品联系起来并不太困难，而我也希望此方法能够为本书增添些趣味性。但若以为我的讨论是穷尽一切，那就错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穷尽一切的分析，我绝无此野心。像往常一样，我只是把自己局限在我认为是关键性问题的范围内。我的理论出发点是巴赫金的著作，这一点随后就见分晓。毫无疑问，巴赫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者。^[3]他成功地顶住了一切针对他的主要批评，因为这些批评对他著作的理解不够全面，再者，尽管他的解读存在问题，但是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中心问题的表达却无人能比。虽然，前巴赫金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的解读仍然在大量出现，但毫无疑问，巴赫金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按库恩的说法），而此范式迫使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家们，不得不依照他的著作对先前出现的一切东西进行重新评价。参照巴赫金现在似乎成为一种必须，甚至在理解颇为单薄的地方也不例外。最近，对这个趋势的反应尤为明显。^[4] 但是，如果仅凭这一认为巴赫金已过时的学术共识，便在其洞察力的全部潜力尚未认识之前就对他的思想加以广泛排斥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巴赫金的模式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能令人信服地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情形下，正如我即将阐明的那样，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断裂带需要我们去探明，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补充工作需要去做。然而，他的模式是那么的强大有力，以至于，在我们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物之前，还不应该将它抛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 19 世纪的作家，当然也会有其他一些十分完美的解读，包括本世纪的古典心理分析法和存在主义解读，但是，除巴赫金之外，它们无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的现代主义特征进行过充分的解读。

要发表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新作，需要对现存的大量研究进行取舍。第二次第三次这么做的时候，更是需要特别的解释。

此书最初是我于 1985 年春应邀给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作一系列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座时的讲稿。次年，我又作过同样的讲座，并对讲稿进行了部分的修改。显然，他们之所以邀请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十多年前发表的一部早期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和谐的小说》（Dostoevsky, the novel of discord）。^[5] 也许，人们对书的著作权应该设立一个“有限成文法”，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后，作者就不应该再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负责。早期的著作很久以前就已经随岁月而去，虽然我在作品目录里还承认它，但是，我现在的观点和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与其他任何一本我知道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也不同。这就是我决定给那些讲稿一个更为永久性形式的初衷。回顾过去，我认为这两本书在关于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整体概念上并非完全不可兼容：在早期的那本书里虽然没有任何理论依据，但试探性提出的“复杂性原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至关重要。为此，有一位评论家曾奇怪地责备我不该引入一个与“哲学和美学”毫不相关的术语。或许，我已开始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并非是意识形态的范畴（如有关上帝、俄国、自由、美、道德的争论），而是另外一些方面，即那些让他带着怀疑和忧虑的目光进行审视的东西。他的“幻想现实主义”（fantastic realism）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那些能够从意识形态的争论或当时的文化气候的角度界定的东西，而是那些从濒临深渊的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艺术概念的角度能够界定的东西（如果它们可以被界定的话）。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压抑他作品中的这些特征，一方面对类似于斯特拉霍夫这样的“朋友”所作的评论作出回应，另一方面则出自他对普希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的艳羡和景仰。

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在其身后文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我与其作品的个人接触。解读不是理论阐释，我不希望有人在其中看见过多不熟悉的术语。有人可能确实会认为此书太过于“直觉”或“人性化”而不喜欢它。但毋庸置疑的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已经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所表现出的洞察力和策略的影响，对其文本已经变得非常敏感。对那些有一定鉴别力的人来说，其文本的洞察力和策略就清清楚楚地摆在那儿。如果说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的话，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诺丁汉大学“批评理论组”所营造的学术环境，我本人有幸自其1979年成立以来就是其成员之一。作为人文主义传统的幸存者，我发现保持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态度（当面对常识和我赖以成长的学术传统时）是极其困难的，我向来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成功的理论必须面对当代实践者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问题，甚至所有问题。我之所以不怀疑巴赫金理论的魅力，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似乎提出了一个可供形形色色文学理论（包括人文主义、基督教和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追随者们会合的共同场地。并且，他的理论还雄辩地解

释了那些追随者们没有在此会合的原因。另外，巴赫金将其最著名的著作献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他关于小说话语的观点也颇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一眼望去，巴赫金在当代文学理论中的位置和地位非常复杂。细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对巴赫金二战前的著作耳熟能详，但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6]他主要作品的译本出现之后，他才开始受到西方非俄罗斯文学理论家们的注意。那时，他的作品在有些方面似乎已经过时，然而奇怪的是在另一些方面却又领先于时代，于是，不久有些人声称，他的“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s）是结构主义的一个难得的替代方案。^[7]更近些时候，有人提出了更加精彩的说法，如迈克尔·霍奎斯特声称巴赫金正“逐渐成为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之一”。^[8]

有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家们意识不到他们周围出现的其他文学理论，但是在某些情形下，他们也会对照另外一些巴赫金或别人所写的东西，来反省自己对巴赫金以及他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理解。这样，一些俄文著作在过去的25年里才第一次问世，其译文也由于迈克尔·霍奎斯特、卡特琳娜·克拉克、卡尔·爱默生、加里·索尔·莫森^[9]以及他们的美国同行和法国的朱莉娅·克里斯特娃、^[10]茨维坦·托多洛夫^[11]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才得以问世。

最近一些有关文学理论的英文著作在巴赫金面前略显尴尬。那些书的作者好像并不在乎将巴赫金省略，可又确实拿不准该如何摆正他的位置，万一他最后变得像托多洛夫和霍奎斯特（甚至像德曼^[12]或者韦恩·布思^[13]）认为的那样重要呢？巴赫金就像是另一个时代和地方来的客人，说着不太正确的语言，然而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而无法简单地将其一笔勾销的现象。巴赫金出现后，许多人试图把他归入心理分析批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女权主义甚至自由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就我而言，我怀疑克拉克和霍奎斯特的观点，我认为巴赫金也很容易归入一种新型基督教文学理论，虽然他的作品里忽略了基督教的一些传统，但他的创作时代毕竟是苏联时期的俄国，他个人与东正教的联系

使人相信，他不会对我这种说法感到吃惊或不快。我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一章提到了这一点。^[14] 其实，巴赫金的一些做法会变得容易理解，只要相信他还是属于那些在其著作中还能找到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等名字的作者，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著作并不依靠这些名字。^[15]

看待巴赫金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不要把他归入近年来西方人所乐此不疲的这个或那个批评流派：把他看成一个提供了理论基础的人，收获可能更大，因为他的理论能够从目前的混乱当中发现并巩固秩序。这多多少少是我在本书中使用巴赫金的方式。我说“多多少少”是因为巴赫金思想的主要问题（也可说是魅力）在于它的非体系性。一些人（如托多洛夫）把这看成一个缺点，而另一些人（如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却视之为优点。巴赫金极其冗长的风格（虽然等到熟悉术语后发现它们并不晦涩）在俄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无论怎么说，它的缺乏系统和它经常回顾过去的习惯，与俄国话语的“未完成式”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对一个崇尚开放和不确定性甚至狂欢的理论体系来说，“未完成式”比封闭性的“完成式”系统当然更合适。在各种时候，许多与结构主义、读者反馈式批评理论、解构主义及其他文学批评理论相联系的洞察力和策略，似乎都可归于巴赫金名下，而且当它们脱离开自己的理论基础后，似乎变成了巴赫金思想的自然发展，且有益无害。它们中大量有趣而又有独创性的东西，大量似乎经历过无比痛苦和艰难后才获得的东西，几乎都是轻轻松松从一个被我称为“修正过的巴赫金”的地方自然流淌出来的。我的方法是把巴赫金的理论当做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通过它将许多低层次的理论连接起来，但基本上不改变每个理论甚感自豪的策略和手段。

有人以为索绪尔（Saussure）为许许多多当代批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巴赫金对索绪尔的批判会使我的方法无效，我反对这样的说法。巴赫金反对的是索绪尔对话语和言语的区分，而对社会评价因素在具体语言中的作用却是坚信不移。^[16] 但是，尽管索绪尔在结构主义及其分支中的历史地位不容否认，尽管那些用自己语言表述的理论的可靠性

(虽然不一定是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索绪尔的联系,但他们最喜欢的策略并不一定要依赖他们自己对这种联系的看法,相反,如果把它们和一个能解决某些理论分歧的、更高层次的理论联系起来的话,它们的可靠性可能会更大。本书不打算为我的方法寻求理论上的支持,而只是从实用主义和可靠性角度出发,将其作为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方式。

就在我执笔的时候,我注意到一篇阿隆·怀特(Allon White)写的文章。他在该文中试图说明:“巴赫金的著作预示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文学语言的看法,但最为关键的是它把它们放在一个社会语言学的框架中,这样可使它们能够从历史和纯粹的社会角度来理解文学。”^[17]他辩论说,“对多重声音的理解,使一个人不仅可以避免最为流行的解构主义的形式泛滥,还可以避免传统结构主义的种种限制。”^[18]虽然他没有继续下去,但接下来提出的这个想法同样有趣,即巴赫金“预示了当前德国关于接受美学的大部分内容”。^[19]要在此总结怀特所有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它既是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的宣扬,也是对巴赫金的宣扬。不过他的结论还是值得一引,或许值得进一步发展。一些明显的标点错误我已纠正:

巴赫金的著作在我看来超越了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揭示出两者都是从一个有着生命力的、错综复杂的语言中演变出来的片面性的抽象。一方面,追随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把语言当做“言语”,将单一话语中的相同结构分离开来,这对于单一语言的社会来说是有效的。另一方面,解构主义之所以使语言变得抽象,是因为语言中的意图和统一看上去不和。这就像是一幅语言地理图,上面标出了滑动、断层线、裂缝,但是省略了它们之间的层次和构成。巴赫金不仅看到了构成,又看到了作为风格和意思组成成分的分支,而解构主义只看到了断层线和一个死胡同,一个极端的窘境。巴赫金的社会语言学知识,使他对话语的功能比解

构主义者有一个更包容的理解。对解构主义者来说，在大多数时间里，话语并没有功能。巴赫金把对语言的理论理解集中到对话式话语上，这样便将两个派别的观点融为一体，成为一个超越二者的批判性文化社会语言学。……“批判性文化社会语言学”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名字。我认为巴赫金实现了魏因赖希提出的、打碎具有同样结构的身份的断言，这是很清楚的。 [20]

我曾试图按照我在早期作品里的做法，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以超越理论的地位，无论如何使之处于一种连续对话和流动的状态中。毕竟，这是一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更为丰富、更加充分解读的尝试，就算是在文学理论领域里有什么收获的话，也是次要的。我应该感谢它。就像托多洛夫所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巴赫金发明了元语言学。 [21]

“复调”（Polyphony）（一种小说的名称，其中作者和叙述者的声音同等重要，互相进入对话）并不是像某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和多声部（heteroglossia）或多重声音（multivoicedness）是一回事。巴赫金在1929年出版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创始人。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小说的对话”中诞生出来的多声调或双声话语，只是一般意义上小说形式的决定性特征而已，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小说里多声调或双声话语找到了最完满的表达（这通常是对另一个声音的回应，预示了另一个参与者的出现）。多声调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一个环境。正如巴赫金所言：

作者的话、叙述者的话、插入的不同流派、人物的讲话都只是一些基本构成单位，借助于它们的帮助，多声调才能进入小说。在它们每一个当中，都可以找到多重社会声音、广泛的联系以及相互关系（或多或少总是对话性的）的存在。声音和语言之间的清晰联系及其相互关系，这种主题随不同语言和话语类型的移动，以及它那融入社会多声对话的涓涓溪流和对话性处理方式